

冲突与均衡 欧债危机后意大利 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分化与重组

□ 严晓鹏 郭保林 陈超颖

内容提要 普拉托(Prato)位于意大利中部,是温州籍华人华侨在欧洲的聚集地之一。欧债危机爆发后,普拉托当地社会与华人华侨冲突不断,华人华侨社会出现分化与重组。本文通过对欧债危机后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跟踪调查,分析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与意大利当地社会在冲突与均衡的博弈中分化与重组的轨迹,并对普拉托华人华侨如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欧债危机 华人华侨 意大利普拉托 冲突与融合 移民社会

作者严晓鹏,温州大学国际合作学院院长,副教授,博士;郭保林,嘉兴教育局;陈超颖,温州大学华文教育研究所。(浙江温州 325035)

温州是著名的侨乡,拥有近42.5万华人华侨,他们大都分布在欧洲,以“拟村落化”的形式在欧洲形成了一个新“中国城”。^①在这些新“中国城”中意大利的普拉托可谓是个典范。普拉托是一座总人口不到20万的小城,但在高峰时期,包含非法移民在内的华人数量曾高达4万,其中近八成来自温州,几乎占了普拉托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庞大的移民群体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不断在冲突和均衡中寻求平衡点。他们一度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受到当地政府的肯定和接纳,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华人群体和当地社会的矛盾冲突不断,尤其在欧债危机后,当地华人的生存境地更加艰难,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

笔者所在团队自2008年起每年派出学者到普拉托进行调研,通过参与观察、个案访谈和追踪研究获得了众多第一手资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追踪研究,力图探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演化及其

趋势,分析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与意大利当地社会在冲突与均衡的博弈中分化与重组的轨迹,并对普拉托华人华侨如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提出建议。

一、普拉托华侨华人社会与 当地社会的冲突与均衡

普拉托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的亚平宁山脉西北麓,临比森齐奥河,东南距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萨16公里。普拉托曾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纺织业重镇,早在14、15世纪,普拉托的羊毛纺织加工业就闻名于欧洲。工业革命期间,凭借领先的纺织生产设备和纺织品加工工艺,普拉托的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进入20世纪,普拉托保持了在纺织品生产方面的传统领先优势,其生产加工的针织品在国际市场上首屈一指。普拉托的华人华侨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后进入普拉托的,二十多年来华人华侨和华人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在当地形成了有影响

力的华人华侨社会。总体来说,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但欧债危机影响巨大,使当地华人华侨社会的变迁出现了一些新状况。

(一)欧债危机前:潜藏冲突,维持均衡

上世纪80年代末,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普拉托的纺织业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而受到较大冲击,许多实力相对较弱的小工厂纷纷倒闭,普拉托纺织业面临危机。而吃苦耐劳的华人移民却从这“危机”中找到了生存发展空间,相关资料显示,1989年,普拉托仅有38名中国人,而截至2006年底,已有超过1万华人持合法居留证生活在普拉托市。根据市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6月30日,普拉托市登记居民人数为18.9万人,外籍居民登记人数约为3万人,外籍人口比年初增加4.03%。华人是当地第一大外籍族群,有合法居留权的有11680人,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在普拉托市出生的父母为中国人的儿童有1300多人,占儿童总数的18%。^②

初到普拉托的中国移民大多从员工干起,他们吃苦耐劳又省吃俭用,几年下来许多华人都攒到了初次创业的启动资金。他们或开中餐馆,或办工厂,过起了亦老板、亦员工的生活。2000年前后,普拉托自立门户办工厂的华人越来越多,凭借价格上的优势,他们很快击败了当地一些意大利服装企业赢得市场。后来,普拉托华人又开始进军面料市场,这对普拉托当地传统的优势产业——面料生产加工构成直接冲击。有统计显示,自2001年以来,意大利人在普拉托注册的纺织企业已减少一半,而同期华人企业迅速增加。2006年,在意大利普拉托外国移民企业排行榜上,华人移民企业以2658家名列榜首,比2004年的2013家增长了32%,占地区企业总数的9.8%。^③随着华人数量的增多和华人企业的迅速发展,华人华侨社会给当地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小视,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普拉托早期的华人移民大多是非精英移民,受语言能力所限,生活圈子相当封闭,加上缺乏沟通意识和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华人华侨社会开始惹来当地居民的微词,当地一名民众对普拉托华人华侨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当地民众的看法:“短短几年时间,普拉托涌入了大量中国移民,他们大声说话、随地吐痰、偷税漏税等,违反上帝

旨意,白天工作,夜里也工作。”

尽管如此,但这段时间普拉托的经济总体而言是向上发展的,普拉托媒体也较多地宣传华人为保住普拉托纺织业的金字招牌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执政的左派政府在外来移民问题上采取友善、宽容的政策,因此,虽然存在着隐藏的冲突,但这一阶段普拉托的华人华侨与当地社会基本保持着和平均衡的局面。

(二)欧债危机后:爆发冲突,打破均衡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意大利受到了较大影响,2009年的欧债危机更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普拉托企业受到了较大冲击。一方面,当地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华人华侨得益于储蓄习惯和相对封闭的生活圈,较少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看到华人逆市购豪车、买工厂,一种“相对失落感”在当地人心中滋生。经济危机的萎靡氛围迟迟难以消散,失落情绪迫切需要宣泄。普拉托人似乎忘记了华人华侨所做的贡献,开始搬出“华人抢了本地人的饭碗,影响了本地人的收入与就业”等陈词滥调。媒体报道几乎全是指向华人华侨社会的负面新闻,指责华人企业偷税漏税、雇佣黑工、不注重厂区安全、生产伪劣产品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种舆论影响下,承诺执政后将着力打击华人社会灰色经济的右派阵营开始执政普拉托。

2009年,普拉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颁布多项政令和法令,打着“打击非法移民、铲除灰色经济”的旗号限制华人企业发展。2009年6月,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在视察普拉托时说,普拉托移民人数已经超出了承受范围,意大利政府决定首先在普拉托市增兵,加大对华人的检查力度,把这座城市还给普拉托人。2010年1月,普拉托政府调集上百名国家警察、40多名宪兵,出动警用直升机,配合税警、市政警察及相关监察部门,特别针对华人企业进行地毯式检查。2010年6月,普拉托当局又进行了“扫黑大中华行动”。仅6月28日一天,就有20多家大型华人企业被查封,被查封的资产超过2000多万欧元。2010年9月,普拉托市长签署针对华人社区的一项歧视性政令,政令规定在华人集中的Via Pistoiese和F·Flizi两条商业街,包括餐饮业在内,营业时间不得超过晚间12时。受此政令限制,普拉托华

人社区餐饮业的生意一路下滑。2011年6月下旬,意警方又对普拉托及佛罗伦萨等地的70多家华商进行突击,没收了价值2500万欧元的财物。此外,还有300多家华商的经营权被冻结。

普拉托政府对华人华侨社会、华人华侨企业无休止地进行整体“打黑”,使华人华侨企业进入了寒冬。一些过去蓬勃发展的公司“生意惨淡,销售额下降了三、四成”;一些实力相对较弱的华人华侨公司则纷纷倒闭。据统计,仅2010年上半年,普拉托倒闭的华人华侨企业就达154家。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得一直隐藏在和平表象下的华人华侨社会与当地社会的冲突彻底爆发,华人华侨在当地的境遇一落千丈,迫使当地华人华侨思索自己该何去何从。

二、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分化

欧债危机与普拉托政府的打压政策对普拉托的华人华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当地惨淡的经济大环境和右倾政策下经常性的搜查“扫黑”行动让生意变得“不好做”;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冲击着华人华侨的意识。出于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自身处境的考量,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出现了分化。

(一)“逃离普拉托”的思潮萌发

欧债危机之后,意大利政府迟迟拿不出恢复经济的有效措施,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许多华人华侨特别是从事商贸活动的华人华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悲观情绪笼罩着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与意大利经济的颓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意中两国经济上的反差及普拉托右倾政策的推力,使部分仅在海外有产业的华人华侨对在当地落叶生根产生了顾虑,回国发展的想法时有发生。不过,由于多年在海外生活,对国内社会有一种陌生感,使得他们对于回国仍有顾虑。“这里的形势对华人华侨不利,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使华人华侨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同时也让我们感觉自己没有作为一个商人的尊严。国内近年来发展得很好,但我到普拉托已经20多年,我的青春在这里,生计在这里,朋友圈子也在这里。回国没有熟人,要办什么事可能都比较困难,所以还是在这看看吧,实在不行就回国

内发展。”这样的观点在一部分出国多年原想在普拉托生根但迫于情势又萌发出回国念头的华人华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两栖商人率先开启将产业向国内转移的步伐

普拉托大多华人华侨,特别是从事商贸活动的华人华侨,其事业都与国内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的直接在国内订货,有的在国内购买原材料,还有的在国内投资产业。两地资源禀赋的差异成为华人华侨的生财之道。作为跨国移民,华侨华人大都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频繁往返于中国与意大利之间,敏锐地探寻两地之间的商机。欧债危机后,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这部分华人华侨调整了发展战略,开始加快产业向国内转移的步伐,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由于普拉托对于产业转移有着较为严格的控制,华人向祖籍国汇款往往被渲染为“洗黑钱”,使一些由市场决定的产业转移受到了人为的阻碍。同时,消费观念超前的欧洲人因欧债危机普遍缺钱,华人华侨们在欧洲的产业要想出手也不太容易。“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人。作为一个商人,市场是吸引我们的最强动力,目前国内有市场,经济发展好,我们肯定会加快产业向国内转移的步伐,如果欧债危机过去了,普拉托经济好转,我们也会把产业转回(普拉托)来”,在普拉托拥有住房、企业并且在国内进行投资的一名华侨在与笔者交流时坦承,“目前国内市场(比意大利)更有吸引力。”

普拉托的华人大多为商人身份,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得他们在意大利面临生存困境时主动寻求更好的发展环境。Salt和Stein认为,经济对移民的迁徙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市场力量主要体现在移民自身选择的经济理性中,移民是一桩“生意”^④或曰是一桩“家庭的生意”,是移民个人、家庭或家族对人力投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的结果。^⑤在欧债危机和意大利的右倾政策的影响下,华人华侨社会出现分化在所难免,转移产业,谋求回国发展是一种出路,但持观望态度,期望意大利局势好转的华侨也大有人在,尤其是一些移民已久、社会关系和亲属都在海外的老华侨和希望安

稳生活、减少动荡迁徙的妇女,在欧债危机后选择了依然留守普拉托。

三、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重组

如果说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压力是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与当地社会矛盾冲突爆发的导火索,那么华人移民与意大利民众在文化、生活习惯和生意理念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意大利人的危机感则早早为冲突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加上长期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问题得不到疏解,导致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因此,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只有在和当地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才能得到重组。

(一)意大利社会要理性对待华人华侨社会

对于意大利社会来说,长久以来欧洲文明发源地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使其具有一种天生的文化优越感,而普拉托作为欧洲的纺织品中心的产业优势又能为当地人带来可靠的经济保障。然而随着大批中国移民的“闯入”,带去了迥异于当地传统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文化上的碰撞与经济上的竞争。华人华侨自成一统,在意大利的地盘建起了一个又一个新中国城。一开始这可能是一种别样的风景,但随着华人数量的增多,意大利人开始感到领地被入侵和自身民族性丧失的危机。更不用说,眼见着这些华人移民进军他们的传统产业,用短短几年时间在他们身边发了大财,过上了比当地人更好的生活,这让很多意大利人觉得无法接受,被掠夺感油然而生。在这种心态下,意大利当局打压华企,“夺回地盘”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国际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普拉托政府与民众也深知,普拉托离开了华人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与中国经济要素的顺畅对接,其国际竞争力将大大下降,如果不支持华人企业,继续打压,普拉托经济会继续走下坡路。普拉托不是不需要华人的力量和华企对经济的拉动,他们需要的是相对规范的、能和意大利的大环境相容的华人社会。

(二)普拉托的华人华侨要主动融入当地社会

对于华人华侨来说,不可否认,华人华侨在当地的某些做法因为打破了当地的传统习惯,容易授人以柄,意大利政府打击华企总是打着“打击非

法移民、铲除灰色经济”的旗号,指责华企雇佣黑工、不注重厂区安全、生产伪劣产品,超时营业扰民。留守普拉托的华人华侨要想寻求可持续发展空间,必须对自身行为进行调整,只有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被主流社会接纳,华人华侨才能有长久的立足之地。

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需要重组,已经成为当地华人的自觉意识。在遭受了大范围和长时间的打压后,选择留守的华人华侨开始对自己的经营行为进行反思。普拉托的众多华商也明白,目前华商已经进入了一个规范市场的转型期,华人经济应遵守当地社会秩序与法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固步自封只会加深矛盾,要解决冲突必须加强沟通和对话。华侨社团开始呼吁和当地政府展开沟通对话,以维护自身权利。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第一副会长郑贤杰先生曾写信给普拉托省督,要求与省督直接对话,希望省督听取华企代表关于税警对华企歧视性检查的申述,通过对话解决存在的社会隐患。^⑥此外,意大利人习惯在法律层面解决问题,而华人华侨大多缺乏法律意识,对当地法律一知半解。为改变这种局面,华人华侨社团组织华商学习中文版意大利《法律指南——在意大利工作和生活》,让华人华侨了解意大利法律,依法保障自身的权益。^⑦

华人华侨积极的沟通态度也得到了普拉托政府的响应。普拉托省省长杰斯特里表示:“缺乏对话是当前双方面临的一大困难,希望华社和意大利方面能够加强交流。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关键阶段,华社完全有可能与当地社会进行很好的融合,然而如果处理不善,也有可能出现矛盾对立加剧的局面。”2012年6月,一场名为“我生活在此的原因”的有关华人移民融合的对话在普拉托举行,主办方希望普拉托当地人与华人华侨之间能弥合分歧、消除偏见。尽管目前这种对话对华人华侨社会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如果这种对话能够持续下去,它就可能真正帮助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

四、结语

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分化与重组是华人华侨在与当地社会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调和的结果。尽管华人华侨为普拉托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在经济上(下转第110页)

在个体道德层面上成为判断个体道德修为的价值尺度,更不该是费尽心思设立各种框格条律,通过法律规范简单地将各种差异因素进行同化、驯化、征服和排除,而是需要从社会制度入手,营造出自由、平等、多元和宽容的社会现实,使每个个体都能在友爱、正义、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平等享有社会发展的各种成果,使每个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还应致力于全球协同机制的构建,面对全球责任和人类共同利益,建立协同共担机制,倡导“每一种差异都是另一种差异生存和成长的条件”,如此不仅“可以击退各种进攻”塑造出社会的协同性,还可以形成同感、移情、想象、功利等多方面的彼此认同,树立全球共同的命运感。只有这样,才能使宽容既成为承担全球共同责任的价值纽带,也成为激发全球文明发展更多可能性的重要机制。

注释:

①《辞海》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510

页。

②房龙:《宽容》,张蕾芳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7 页。

③衣俊卿:《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4 页。

④吉登斯:《社会学》,赵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648 页。

⑤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9 页。

⑥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思想》,卞崇道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 页。

⑦图海纳:《我们能否生存——彼此平等又相互差异》,狄玉明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13 页。

⑧于尔根·哈贝马斯:《信仰与知识》,《法兰克福日报》2001 年 10 月 15 日。

⑨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高湘泽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31 页。

责任编辑 俞伯灵

(上接第 104 页)的竞争和文化上的差异,还是招致了当地人的微词,加上语言不通,华人华侨社会与当地社会的长期隔离使得冲突的种子一直存在。随着华人华侨数量的增多和华人华侨企业规模的扩大,冲突愈演愈烈,矛盾终于在欧债危机后较为显形地爆发出来。华人华侨社会与普拉托当地社会的冲突是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实现均衡发展,既需要双方遵循规则相对平等、可以有序竞争的经济秩序,也需要文化上的互相包容和接纳,而实现这两个条件的前提是加强双方的沟通 and 理解。意识到这一点,华人华侨已开始主动调整自身行为习惯,学会“入乡随俗”,遵守当地的法律和规则,同时积极寻求和当地主流社会的沟通与对话,这期间包括与政府的沟通、与媒体的沟通、与民间组织的沟通与民众的沟通,而意大利政府和当地社会也对华人华侨社会的这种努力给予了积极响应,只有在双方长期共同的努力下,华人华侨社会与普拉托当地社会才能实现均衡双赢的发展。

注释:

①王春光:《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荷

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0(5)

②宋建、王昀加:《普拉托华社之 20 年变迁》[N]. 新华网.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08/8239689_0.shtml. 2011-8-8

③中新网. 意大利普拉托华人移民企业壮大总数达 2658 家.

<http://news.qq.com/a/20060703/001190.htm>. 2006-7-3, 转引自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

④Salt John, Jeremy Stein. Migration as a business: the case of trafficking[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97, Vol. 35(4).

⑤Herman Emma. Migration as a family business: the role of personal networks in the mobility phas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6 Vol. 44(4).

⑥意大利普拉托华商致信省督府 呼吁终止歧视性检查[EB/OL]. <http://news.qq.com/a/20070706/001895.htm>. 2007-7-6

⑦意大利《法律指南》中文版首发 驻意大使出席[EB/OL]. <http://news.sohu.com/20090508/n263848627.shtml>. 2009-5-8

责任编辑 徐东涛

Authoritative Effectiveness Governance in Urban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T Community (86)

Tang Weny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tate permeates from top to bottom, and the society grows from bottom to top, what mod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will be shaped? This article revealed the mode of "authoritative effectiveness governance" in urban community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 community. The mode of "authoritative effectiveness governance" shows the relation of "authority—obedience" between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power in community, and social power acts as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 the state permeating to social life. Under the mode of "authoritative effectiveness governance", there is a "managerial public sphere" with limited social initiative and publicity, the main function of which is to expand the state's capacity of public services in community and assist the state to realize "soft control" over community.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state; society; authoritative effectiveness governance

**Social Exclusion Reason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solated Community:
Take Leprosy Isolation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95)

Zhuo Caiq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summarized H organization's 16 years service experience for leprosy isolation community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explored the social exclusion reason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solated community. The social exclusion of isolated community mainly performs as the community exclusion, system exclusion, family exclusion and self exclusi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solated community mainly develops from improv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bility of isolated community and enhancing the acceptable ability of social environment.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bility include improving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ntegrating into community,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ntegrating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acceptable ability of social environment includ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volunteer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advocacy, etc.

Key words: isolated community; social exclusion; social integration; strategy

**Conflict and Balance: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Prato, Italy after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101)

Yan Xiaopeng¹, Guo Baolin², Chen Chaoying³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2. Jiaxing Bureau of Education, Jiaxing 314001, China; 3. Institute of Chinese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Prato, locates in the middle of Italy, is one rendezvou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from Wenzhou in Europe. After the eruption of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Prato local society and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were in conflict.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appeared differenti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Prato after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analyzed the track of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and Italian local society in the conflict and balance between them, and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Prato about how to integrate into local society.

Key words: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overseas Chinese; Prato, Italy;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immigrant society

On Civilization and Tolerance (105)

Wan Bin, Xie Hui

(College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Down the ages, "civilization" has been identified and respected by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n effective civilization mechanism has not been formed nowadays. Violence, terror and